

中國記者與時代的交光互影

李金銓

記者記錄政治，也介入政治。記錄時代是記者的天職，但新聞與政治關係太密切，記者可能身不由己介入政治。媒介和權力結構像跳一支探戈舞，領舞的總是權力結構，跟舞的總是媒介，領者和跟者配合才跳得起舞。換句話說，權力結構是首要的現實界定者 (primary definer of reality)，是第一性，而媒介是次要的現實界定者 (secondary definer of reality)，是第二性。卜少夫形容記者一生記事「是歷史長河中必不可少的浮沉泡沫，是歷史的一部分，也反映了時代，是那個時代不可缺少的見證」^①。形容記者記事是「浮沉的泡沫」，因為新聞是歷史的第一稿，雖然斷簡殘篇，支離破碎，卻是不可或缺或磨滅的初稿。反過來說，逝者皆如斯乎，在擾攘眾生當中，究竟有幾人能夠留下一片雪泥鴻爪？筆者選擇蕭乾、陸鏗、劉賓雁三個個案，是因為他們在近現代中國不斷捕捉新聞，製造新聞，甚至不斷捲入國共最高層權力鬥爭的風暴，他們不但寫在時代的邊上，有時候更是寫在時代的中心點上^②。



一 三個「非常態」個案的比較研究

個人和時代是交光互影的。社會學家米爾斯 (C. Wright Mills) 說，要了解世界上發生了甚麼，甚至要了解個人發生了甚麼，都必須把個人看成「社會裏面傳記與歷史交匯的小點」^③。這句話有「社會」、「傳記」和「歷史」三個關鍵詞，傳記

是個人生命在時代脈絡下的呈現，歷史則是許多個人在社會生活的共同記錄，傳記有時代的烙印和意義，歷史抽離個體也是抽象空洞的，而傳記和歷史必須在「社會」交匯。在分析上，米氏認為必須着眼三方面：第一，社會結構整體與部分有何關係，有何特徵，常與變是甚麼？第二，這個社會在歷史上有何特殊地位或意義？第三，各種人在這個時間和空間進行哪些活動，彼此有何交鋒、壓制和解放④？筆者在這裏提出記者與時代的命題，其實就是要回答社會學的一個基本問題：「原動體」(agency) 和結構 (structure) 之間是如何交涉 (negotiate) 的？就組織內部關係來看，記者是原動體，報館是結構；就組織外部關係來看，報館是原動體，權力中心是結構。簡單說，國共政權如何制約報館的運作，而報紙能發揮多大的能動性？報館如何制約記者的運作，而記者又能有多少作為？反過來說，記者對於報館的角色和時代的脈絡起甚麼作用？筆者想透過三位著名記者的生命史 (life histories)，探討近代史上國共政局變化、報紙與記者的互動關係。

中國近現代報業有三個主要的範式：一是商業報，最有錢，其中以《申報》和《新聞報》為代表 (其中包括很多小報，林語堂蔑稱之為「蚊子報」⑤，茲不置論)；二是專業報，最受尊敬，以《大公報》為代表，是中國文人論政的典範，善於商業經營，卻不以牟利為目的；三是政黨報，最有權勢，包括國共兩黨的喉舌。民國時期這三類報紙同時存在，有些報人出入其間，未必壁壘分明，也不是非黑即白。1949年政權遞嬗以後，商業報和專業報從式微到消失，剩下黨報一枝獨秀⑥。筆者選擇了《大公報》的蕭乾、《中央日報》的陸鏗以及《人民日報》的劉賓雁，聚焦於專業報和國共黨報等三方面的比較，商業報的分析只能俟諸異日了。

選擇這三個人，是因為他們有指標的意義：他們從1930年代橫跨到世紀末，在新舊交替的不同十字路口上，各領風騷，象徵了當時新聞界的標竿，形成一幅綿延立體的連續圖。在專業角色上，他們是異數，是例外，不同凡響，界定了大時代下記者的「可能性」，故在方法論上本文屬於「非常態」的比較個案研究 (comparative deviant case study)。了解「非常態」的主旨還在於彰顯「常態」，因此筆者希望探討：個人在特定的制度下能夠發揮甚麼專業能動性？這個能動性的邊界伸展到哪裏為止？記者和報館在歷史上扮演甚麼角色？

這三個個案如何代表他們的報館乃至報業範式？第一，合而觀之，他們都是「後五四」的同代人，蕭乾比陸鏗大九歲，陸鏗比劉賓雁大六歲，蕭乾比劉賓雁大十五歲。他們經歷了共同的時代背景，揚棄舊禮教的束縛，接受新文化的洗禮，處在國族存亡、社會動蕩的關頭，嚮往西方 (英美或蘇聯) 的進步，進而見證了國共政權轉移翻天覆地的變化。中國記者一向自認為知識份子，秉承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，不甘做單純的專業新聞記者；中國報紙與政治又有千絲萬縷的關係，所以他們一生所做的，有的屬於記者分內事，有的超出記者的職責，在政治黨派邊上游弋，這是和西方專業記者迥然異趣的。以蕭乾、陸鏗、劉賓雁為代表，他們相信文字有改造社會的力量，企圖以新聞這個新興行業實

現個人的英雄情懷，以及繼承為民請命的傳統，企圖以所學貢獻國家社會的現代化。他們不啻再現了這幾十年的時代精神，每每必須在時代變化的時刻抉擇一條安身立命之道，不管選擇哪一條道路，都必須付出沉重的承擔。他們的心曲是個人與時代的糾葛，是大我與小我的互動，也都具有悲劇的色彩。

第二，個人的信念和報館大體上必須結合，否則難以成事。蕭乾、陸鏗、劉賓雁不僅代表他們個人，更彰顯了所從屬詮釋社群 (interpretive community) 的話語。但他們和報館的關係也不是密不透風的，彼此有分合的時候。在整個意識形態的光譜上，《中央日報》是右派，《人民日報》當然是左派，《大公報》則是中間派。以這三個記者而論，陸鏗信仰民本主義，在《中央日報》裏面比社評立場向中間靠攏一些，算是「中右」，因為揭發孔祥熙、宋子文貪污案而觸怒蔣介石，後來還和報館分道揚鑣；蕭乾受到西方自由主義的薰陶，在《大公報》裏面比社評立場左一些，算是「中左」；而劉賓雁崇拜馬克思主義，他的報紙《人民日報》自然是左派，但他在報社裏面卻是有名的「右派」記者，最後以「資產階級自由化」的罪名被開除黨籍。政治標籤必須放到相對的語境中理解才有真意。

第三，他們的新聞生涯軌道有平行的時刻，也有交叉的時刻。在民國時期，蕭乾已名聞遠近，陸鏗有幾年的輝煌，劉賓雁尚未入行。進入共產中國，他們「殊途同歸」，在1957年的歷史點相會，無一倖免成了「右派」，再歷經文革的磨難，前後被奪筆二十二年。1979年平反以後，他們再度走向「偶爾相遇」的不同道路：蕭乾脫離新聞界，選擇在言論安全範圍之內，堅持不說假話，但真話說得不夠多；陸鏗在海外開闢新聞場域，卻捲入中共高層的政治鬥爭，是胡耀邦下台的導火線；劉賓雁從牛棚重回新聞戰線，是1980年代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報告文學家，但時間很短便被迫流亡美國，至死無悔追求那遙不可及的社會主義理想。他們站在新聞第一線，對於家國變化和時代脈動感受最深刻。他們在權力邊緣記錄時事，有時算是「半圈內人」，偶爾捲入是非圈內。在社會動蕩的洪流中，他們如何實現新聞的夙志？用米爾斯的話，個人的傳記如何和時代的歷史對話？

筆者希望通過比較的視野考察異同，一方面以大見小，一方面以小見大，探索時代、報館和記者的交光互影。這是韋伯式「理想型」(ideal type) 的分析方法，刻意擴大觀點、視野或物事的差異，以方便觀察和比較。細考少數標本個案，旨在編織一幅馬賽克式的描圖 (narrative mosaic)，展現個人、行動、大小生活世界層層作用與互相滲透，這種分析以提煉洞見為主，由於案例太少，因果關係宜粗不宜細^⑦。筆者將聚焦於記者的生命史，以其本人的回憶錄為基礎，參酌其他材料以斷其真偽，重建記者在歷史舞台活動的場景^⑧。在各種資料之中，除了私人函件和隱秘的日記以外，回憶錄應當最能呈現傳主 (即前面所說的「原動體」) 的內在心迹和外在活動。好的回憶錄觀照全局，又有內心深處的真實感受與省思，有血有肉，親切具體，理性和感性兼而有之。但回憶錄可能有意無意為自己、為別人隱諱，讀者只看到作者片面呈現的部分。回憶錄不可以不

信，也不可以盡信。若根據當年的原始素材(如日記)撰寫的，可信度自然較高，然多數回憶錄都是憑事後追憶，必然有「選擇性的記憶」，若再摻雜其他動機，則其可靠性更可疑。

在方法論上，筆者採取兩個策略以處理回憶錄可能產生的「效度」(validity)和「信度」(reliability)問題。第一個策略是深入閱讀傳主的回憶錄和作品，從人與事的探索取得同情的了解；接着拿傳主的記錄和同事、同行甚至「重要關係人」(也即是社會學家所說的“significant others”)留下來的記錄互相參證。當然，證據的累積未必保證結論的正確，但材料經過多方參證，往往可以揭示意外的線索，發現片面記載的破綻，因而減少分析和判斷上的錯誤。近年來出版的相關回憶錄愈來愈多，對筆者的分析頗具借鏡之益，但傳主畢竟距今不遠，禁忌尚未完全解除，因此未來尚有補充和修訂的空間。第二個方法論的策略，則是盡量由一點開展到一線，進而把事件放在全面的架構內索解，聯繫傳主的文本(text)和時代的脈絡(context)，以了解傳主在撰寫報導時的政治和經濟條件、時間和空間的網絡與座標。這樣由點到線到面，再由面到線到點，出入宏觀和微觀之間，庶幾不至於顧此失彼或本末倒置。若把有些事情孤立起來，則無法準確建立事情的普遍性和特殊性；所以必須不斷探索記者與時代的對話，才接得通米爾斯的研究旨趣。

二 時代與英雄的相互塑造

司馬遷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」，這是中國史家的最高境界。記者處在上層社會的底層，他們在權力邊緣記錄時代的遞嬗與動亂，撰寫歷史的初稿，有時候因緣際會，有時候因勢利導，有時候身不由己，可能在重要的關頭或時刻捲入權力中心，留下那個時代的腳印。時代風雲，雷霆萬鈞，變化多端，個人何其渺小。但個人縱使再渺小，甚至身不由己，在歷史關頭上仍須做出某些抉擇，並為之付出代價。就記者、報社和時代的關係而言，筆者僅擇要歸納如下四點：

第一，每當權力結構在鐵的紀律下，只有一個主義，一個領袖，一個口徑，那麼言論界就只能緊跟着權力當局，當工具、喉舌，做啦啦隊；一旦派系鬥爭白熱化，勢均力敵，甚至群龍無首，以致雜說紛陳，浮現不同的口徑，當局的統制力量減弱，這時言論可能紛亂，但喘息的空間反而擴大。蕭乾面對的是外國租界、軍閥割據、國共鬥爭，陸鏗面對的是美國介入國共鬥爭，劉賓雁面對的是中共改革派與僵化左派鬥爭。這是時代提供記者活動的場景。近代中國亂局頻仍，這個場景說變就變，極不穩定，別無制度的保障，一旦情勢變化，權力洗牌，記者的災難可能就在前頭。國共政權易手以後，無論在中國大陸或台灣(直到1987年解除戒嚴、1988年開放報禁為止)，權力一統，新聞控制變本加厲；香港則在國際冷戰、國共衝突、殖民統治的夾縫中，開出新聞自由的奇葩[◎]。

第二，記者必須在適當的時機進入適當的報社，與時代配合無間，他們的才華始能充分發揮。蕭乾在報業轉型期進入寬容的《大公報》，陸鏗馳騁於特殊政治環境的南京《中央日報》，劉賓雁在順應整個改革開放勢頭的《人民日報》發揮作用。但面對相同的環境，只有少數人能抓住機遇，做出轟轟烈烈的事：蕭乾在《大公報》的眾多能手中出類拔萃，而南京《中央日報》並沒有第二個像陸鏗那樣虎虎生風的記者，《人民日報》也找不到第二個比劉賓雁更憂苦的「青天」，這些都不是偶然的。蕭乾所依託的精神資源以及他所成就是文學，在陸鏗便是政治，在劉賓雁則是裝了滿肚子的道德理想。在變動的時代面前，個人何其無奈甚至無力。但個別人物開啟風氣，扭轉潮流，成敗得失之間實未易言，其歷史意義不應該一筆抹煞。

第三，這三家報社在個別時代的角色迥異，既給記者帶來發揮的機會，也限制他們發揮的場域；既容許個人的能動性，也界定了這種能動性的極限。蕭乾的《大公報》背景，使他先後成為中共統戰、鬥爭、統戰三部曲的對象。陸鏗倘若和《中央日報》或國民黨當局無恩無怨，是否能避開中共的牢獄，不得而知；但料想他不會在「對台統戰」的需要下被釋放到海外「放炮」，更不可能訪問胡耀邦再掀政海風浪。劉賓雁的命運和報社的命運捆在一起，然而在最開放的時刻，連培養他的報社也未必敢用他的敏感文章。《人民日報》頂不住中共最高層權力和意識形態鬥爭的壓力，劉賓雁成為犧牲品。

第四，在重要的時代轉折點上，他們必須選擇不同的安身立命的道路。1949年，蕭乾放棄英國教職回北京，從此不再是記者。同年，陸鏗從海外冒險回大陸接着，自投羅網，三十年後離開大陸，又在海外新聞界到處串聯。1987年劉賓雁被開除黨籍，流亡海外，還在追求社會主義的理想。時也，命也，說蕭乾無怨無悔未免矯情，但陸鏗和劉賓雁即使歷史重演還是會做出同樣的選擇。

記者的命運鑲嵌了時代的烙印，既有歷史的偶然性，也有歷史的必然性。以劉賓雁為例，其偶然性是因為他在文革結束後碰到一個大開大合、思想解放的時代，人勢兩相契合。《人民日報》從1979到1981年為改革勢頭推波助瀾，他引進蘇聯「揭露報告文學」的匕首，使新聞報告貼近人民，站在黨內開放的一邊向保守的一邊宣戰。其必然性又分兩面：一是時局變幻莫測，思想解放的窗口開得快也合得早，如一盞忽明忽暗的燈火，如在收收放放的殘酷鬥爭中走鋼索，如被搖擺不定的鐘擺夾住。及至黨內最高權威重新建立，報紙只能隨着黨內鬥爭浮沉，劉賓雁在夾縫中旗幟鮮明地奮鬥，遲早要栽跟頭，最後成為悲劇英雄。二是劉賓雁個性執著，使命感強，自認被群眾推着走，飛蛾撲火，明知前面有虎，還是義無反顧向前奔。他在特殊的時空開創了新聞的報告文學，但很快就被政治現實湮滅。一個響噹噹的名字，被專制封閉的政體消音幾年，竟然銷聲匿迹了^⑩。再說陸鏗闖進「孔宋案」，那是蔣介石政權內外交困的時候，必須利用此事平息民怨，爭取美國的同情。後來，陸鏗又「無意間」介入中共最高層的政治鬥爭，加速胡耀邦倒台，以致有「我雖不殺伯仁，伯仁因我而死」之嘆。這是陸鏗這個人和他那個時代的「天然」結合，缺一不可；縱使不身陷大

陸，憑他的個性和時代的扭曲，在海外也必然要吃盡苦頭，對此陸鏗是有自知之明的。蕭乾前半生開創了「文學新聞」的新文體，後半生心靈受到扭曲，憋住話不敢講，有謂「家國不幸詩家幸」，是耶，非耶？

時代創造英雄，英雄在特定的條件下是否也創造了時代？如今塵埃落定，三人都已走過狂暴的歷史隧道，中國近代新聞史留得下他們的痕迹嗎？

註釋

① 這是卜少夫評論陸鏗時說的話，參見陸鏗：《陸鏗回憶與懺悔錄》（台北：時報文化出版公司，1997），頁623。

② 為了對《二十一世紀》二十周年聊表敬意，謹摘錄一篇尚未發表的長文〈記者與時代相遇：以蕭乾、陸鏗、劉賓雁為個案〉部分前言和結語，以就教讀者。

③④ C. Wright Mills, *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* (New York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59), 7; 6-7.

⑤ Lin Yutang, *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* (Chicago, IL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36), 131-41。他說《申報》「編得很濫」，《新聞報》「根本沒編」，但對《大公報》讚譽有加。

⑥ 李金銓：〈近代中國的文人論政〉，載李金銓主編：《文人論政：民國知識份子與報刊》（台北：政大出版社，2008），頁18-27（簡體版，《文人論政：知識份子與報刊》〔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8〕，頁15-20）。

⑦ 關於生命史研究方法的討論，參見Howard S. Becker, "The Life History and the Scientific Mosaic", in *Life Story Research*, vol. 1, ed. Barbara Harrison (London: Sage, 2009), 3-13; Peter Abell, "Narrative Explanation: An Alternative to Variable-Centered Explanation?" *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*, vol. 30 (2004): 287-310; Roberto Franzosi, "Narrative Analysis—Or Why (and How) Sociologists Should be Interested in Narrative", *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*, vol. 24 (1998): 517-54。

⑧ 例如蕭乾：《未帶地圖的旅人：蕭乾回憶錄》（台北：時報文化出版公司，1994）；《蕭乾全集》，共七冊（武漢：湖北人民出版社，2005）；陸鏗：《陸鏗回憶與懺悔錄》；劉賓雁：《劉賓雁自傳》（台北：時報文化出版公司，1989）。

⑨ 關於香港的新聞自由的討論，參見Joseph Man Chan and Chin-Chuan Lee, *Mass Media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: The Hong Kong Press in China's Orbit* (New York: Guilford Press, 1991); Chin-Chuan Lee, "The Paradox of Political Economy: Media Structure, Press Freedom, and Regime Change in Hong Kong", in *Power, Money, and Media: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*, ed. Chin-Chuan Lee (Evanston, IL: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, 2000), 288-336（此文中文版收入李金銓：《超越西方霸權：傳媒與「文化中國」的現代性》〔香港：牛津大學出版社，2004〕，頁205-38）。

⑩ 劉賓雁被開除黨籍以後，對香港記者說：「有些話方勵之可以這麼講，我不能，即使我這麼想我也不能這麼講。他再不濟，他可以搞他的天文物理研究，這個沒人干涉他。可是要是不讓我發表作品，我就完了。」參見李怡：〈再訪劉賓雁：從黨員到非黨員〉，《九十年代》，1988年5月，頁27。方勵之、王若望、劉賓雁一起被開除黨籍。1989年天安門事件，方躲到北京的美國大使館避難，後經外交斡旋赴美。如今，筆者遍問許多中國大陸的海外學生，已經很少人知道劉賓雁的名字了。